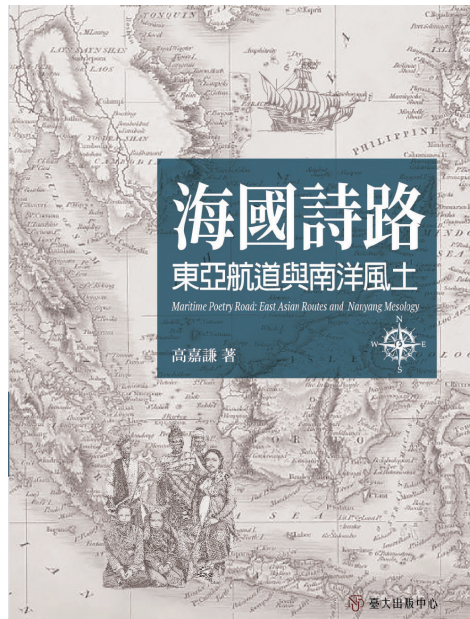


海國詩路——交纏的文學航道

高嘉謙*

一、從十九世紀地圖談起

認識《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¹這本書，可以從一個具象的起點展開：書的封面底圖是一張十九世紀初的外國地圖集所繪的東印度群島地圖。它提醒我們一個常被忽略、卻決定了近代東亞「出洋經驗」面貌的知識前提：南海（South China Sea）是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陸緣海，其最南端的馬來海域，荷蘭與英國的殖民存在至少已延續數百年。如此而言，我們談清末士人「出洋」或「域外遊歷」時，他們所進入的並非抽象的南洋，而是一個被航運網路、殖民港埠、帝國交通秩序所重新編碼的世界。



圖一：《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書封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¹ 本書獲國科會人社中心 2024 年「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補助，並榮獲中央研究院第十四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因此，這本書要處理的不是「海洋文學」的浪漫想像，而是一個更具結構性的問題：航路如何把人、文本、知識與地緣政治綁在一起。十九世紀以後汽船公司形成的路線——從印度洋、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北上日本——在這條線上穿梭的有英國船、日本船、法國船；他們停靠在英國殖民地港口，也是清代後期大量官方使節「必經此線」。換言之，這是從帆船時代延續至汽船航運的東亞航路，亞洲海域清晰可見的殖民地「迴路」(circuit)，然而帝國航道同時也是詩路的參照。

如果把這條航道，轉化成一個文學提問：在這條交通要道上，行旅者如何與不同文化接觸？如何與在地環境連結？他們會遭遇怎樣的機會與風險？如何拓展事業，甚至完成在地身分的轉換？而文學——尤其漢詩、竹枝詞、粵謳、筆記等——在這個互動與歷史交纏的過程中，能展示什麼視點與意義？



圖二：十九世紀東印度群島地圖

(圖源：John R. Borchert Map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提供)

二、「海國詩學」的思考框架

這本書的副標題為：「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透過海域跟地緣關係下的連動，作為提問的開端，從東亞北端的琉球，到馬六甲海峽周邊的新加坡、檳城跟棉蘭，或是爪哇海周邊的印尼群島。這是我們熟悉的東亞航路的一個海上路

段，我採取的轉向，不以國別史的政治疆界為主要框架，而以海域的連動性作為起點。這裡有三個關鍵視角：

1. 跨洋路徑：島與島、海與陸、內地與外沿

「航路」不是背景，而是生成文本的裝置。它讓邊界變得可移動：一段航程會帶出新的見聞秩序、新的時間感（航程、靠港、換船）、新的知識工具（測量、度量衡、海圖、航海術語）。因此閱讀行旅者的文本，同時可以建立其中的連動脈絡，不再只是「點到點」的記錄，而是點—線—網絡的連鎖書寫。

2. 南方的「生態一致性」

如果我們把東亞航路的南方區域視為一個共同的生態圈：溫暖潮濕的熱帶氣候、身體與疾病的適應、南島民族與移民社會、殖民地港埠制度與景觀，其中還有自成系統，且延續了數百年的文化與貿易的交際往返。那麼文學的「地方感」就會呈現出另一種意義，我們不僅止於描述生活在哪一國，而是探究在這種風土條件下如何生活、如何感知。

3. 群島思維：島嶼、半島、大陸、海洋與人的交纏

從群島思維（Archipelagic Thinking）的角度而言，馬來海域就是島嶼、半島與海峽的連結，箇中的意義在於關係性的開展，海域間的路徑、流動，及其文化生成的交纏關係。在我們思考南來華人／華文時，「境外華文」（或黃錦樹稱之「境外中文」）的移動性，往往發生在知識人的移民、過境、派駐、旅居、戰時流離等，他們會在不同島港之間不斷轉折、流轉，因而觀察相關文學的生產，其文學性的表現往往更該被注意的，是那些新的或交雜的語彙、混雜的聲音（包括方言）、混合的社會狀態與倫理、以及對「華／非華」（華夷）秩序的再辨認。

三、海國·詩路·風土

這本書標誌「海國詩學」，其實可以作為總結性的框架概念。全書透過三個關鍵詞把材料串聯起來：

1. 「海國」：航線形塑的外部世界想像

綜觀明清以後的海洋知識（例如《東西洋考》以降），航線本身就是知識視野，把海域外的海國印象組織起來。到了十八世紀後，南海地緣政治變動；十九世紀後期清帝國恢復官方出訪，這些都意味著海國的遊歷與探知，變成重新理解海洋秩序的一部分。

2. 「詩路」：遷徙、行旅與世界觀

「詩路」不是簡單的把詩與地圖連動觀照，而是長時段的遷徙、移居與行

旅，伴隨文化接觸與生活感受而生產的詩文，如何揭露背後的地理知識、風土視野、以及島嶼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性。

3. 「風土」：從環境到身體的互動

根據楊儒賓教授的研究，「風土」這個概念在中國思想史自有其發展的脈絡。但在討論南方航路的「風土」，可以兼顧思考中醫系統的「方土」概念。其主張身體內在環境可連結外在人文環境的情感空間與生活習俗。南洋的熱帶疾病、濕熱、飲食與居住，都迫使行旅者把「環境」變成「身體的問題」。

與此同時，借用和辻哲郎的「風土性」(fūdōsei) 概念，以及邊留久 (Augustin Berque) 將「風土性」(médiance)，轉化為一個複雜的環境跟文化之間的一種互動跟調解作用。他延伸詮釋了「軌跡性」(trajectivity) 的必要，那是人與環境之間，一種動態調解與中介生產的過程。這讓我們透過文本，理解主體位置如何在移動中改變的軌跡，其實就是從文學發生的細部和局部，去討論航線帶來的一種移動的機遇跟能動性。

參照華文文學的研究脈絡，黃錦樹談「境外中文／另類租借」，張錦忠以「Sinophone」的「華聲漢音」強調聲音與語境的駁雜；王德威談「華夷風／華夷風土」重探行旅者主體位置的交換與變化。這些理論資源都共同指出，在航路上生成的，不只是地理見聞，而是主體與世界關係的再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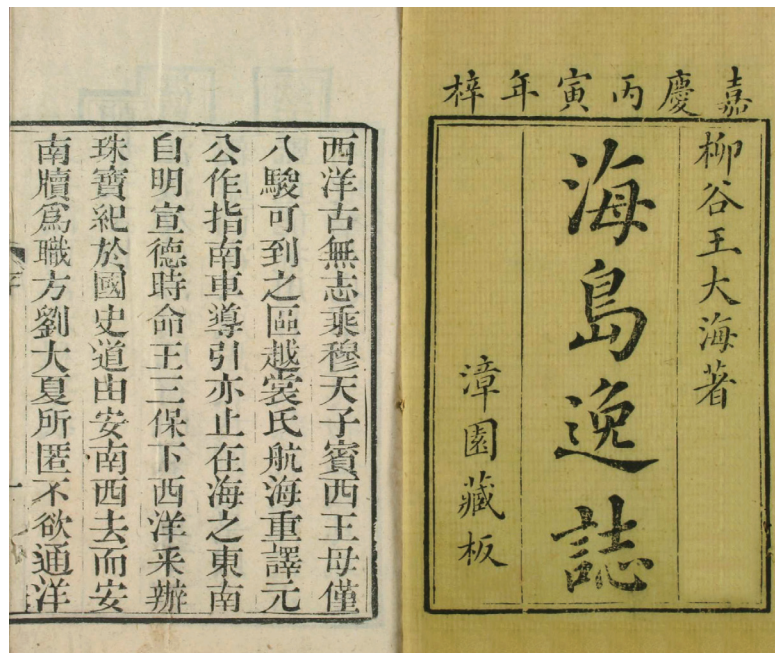
四、航路上交纏的文學與歷史

(一) 技術、知識與聲音的風土

在日本鎖國、明清海禁時代，琉球在東亞航路與東南亞貿易間扮演關鍵角色，與馬來海域有著密切的連動。因而全書從琉球海域開始，關注康熙年間的琉球冊封使徐葆光，藉由出洋經驗完成的《中山傳信錄》(1721) 及《奉使琉球詩》(1733)，讓我們看到航海測量、路線規劃、海上時間感如何改變詩的語言——技術不是外在背景，而是詩語的變革力量。在這裡，「海域」重置了詩與地理知識的關係。

接著南下到「馬來群島世界」(Nusantara)。乾隆年間福建人王大海旅居爪哇十年，他的長期在地經驗在清代對外交通記錄裡相對罕見。他的《海島逸誌》(1791) 對殖民地下的東印度群島 (印尼群島) 的民族、風俗、物產、自然地理、奇譚怪事都有較細緻的觀察。這樣的文本使我們能看到中國人建立「南島視界」時的辯證：中國人如何看南島民族與殖民者洋人？又如何能在獵奇與磨合之間調整眼光？在這裡，「旅居」比「短遊」更能迫使書寫面對日常倫理與生活技術。

而位處馬六甲海峽南端的新加坡，作為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國人移居的重鎮，粵謳這類粵方言的民間歌謠體賦予了殖民地華人另一種特殊的「聲音」張力。粵謳從嶺南往境外擴散，隨報刊雜誌傳播，穿越橫濱、上海、港澳，再到新加坡、馬來半島等地，仿如一種沿航路流動的「聲景」(soundscape)。粵謳常出現在報刊小角落，卻能把市井生活、方言語感、社群共同語與家國話語（維新、保皇、革命、新民）交纏在一起。甚至不乏描寫聲色場所的妓女、嫖客、老鴿等生活題材，透過文人的粵腔模擬，諧趣和勸誡，帶出情感與倫理的混雜。「風土」不只是自然景觀，而是殖民港埠裡的生活與情感空間。



圖三：漳園本《海島逸誌》（圖源：高嘉謙翻攝）

（二）使節漢詩與過境的地緣政治

十九世紀後半官方使節頻繁出洋，有的過境、有的派駐，他們的詩往往包含對南島風土的判讀，也直接撞上殖民地秩序下的社會問題。例如王之春赴俄外交途中停靠新加坡，詩句一方面指出新加坡的地理要衝，另一方面也流露對殖民利權結構的觀察；其隨行官員潘乃光詩中「利窮山海誰先得，界混華夷未易爭」這類句子，揭露的不是單純的風景抒情，而是一種外交知識的警覺，承認眼前的華夷秩序已變、命名框架不足（「疆非禹甸不知名」），並且把稽針度、英尺等度量概念帶入詩中——詩在此成為重新安置認識框架的場域。



圖四：1905 年新加坡牛車水妓院一景
(圖源：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授權使用)

另一個關鍵個案是檳城副領事張煜南。他完成《海國公餘輯錄》(1898) 和《海國公餘雜著》(1900)，不只補充地理知識，更輯錄航路上來往者的詩作，成為一種自覺的「海上詩路結集」。更有意思的是他寫〈海國詠事詩〉，即使未必親至諸地，仍以檳榔嶼前線所匯聚的知識與人脈，去模擬沿航線往下走會遇見的海國，並結合風土、航道、殖民港口景觀展開寫作。這讓我們看到，殖民港埠不只是停靠點，而是一個知識與文學的匯流站。

而派駐新加坡的領事群體（如左秉隆、黃遵憲）則展現另一種緊張：他們既要交涉殖民官僚系統（如華民護衛司），又要面對移民社會的生存問題。黃遵憲〈番客篇〉對在地華人群體的觀照，從峇峇婚禮等風俗切入，折射海禁與移民飄零的歷史陰影。這些作品讓「使節詩路」不只是官員個人行旅，而是把士、商、勞動群體構成的移民社會，一起組裝詩的視野。

到了二十世紀初，像在新加坡領事館任書記官的楊雲史，開始有意識地召喚「南溟」概念。南方不只是地理方向，而成為帝國崩解與殖民世界重新布局下的政治視野定位。詩人視野的構成，環繞在海域及其周邊關係，彰顯海外華人史跟地緣政治的辯證關係。

（三）創傷、華文教育與「文」的斷裂與存續

二戰期間的檳城淪陷，稱為彼南。檳城作為港埠本具人文匯聚性，而鍾靈中學師生在日侵時遭迫害、多人遇害，成為地方災難史。文人教師管震民以舊

體詩、祭文、碑序等形式書寫創傷與見證，於是「華文／華文教育」不再只是文化名詞，而與生命、倫理、公共記憶緊密相連。

在戰前抗日援華的連動情感下，「華文教育」在戰時容易被昇華為華人精神的存續象徵；而教育者的犧牲使「文」呈現斷裂與延續的張力。這也回應和緊扣本書的主軸：航路與港埠所構成的流動板塊上，文學不只抒情，它也承擔歷史記憶的保存與重寫。

因此，這本書凸顯的關鍵命題：「文學航路與殖民地港埠交纏的網絡」。海洋是框架，航道是線索，但關鍵是透過海國／詩路／風土，看到移動如何改寫主體位置、感知方式與知識秩序，並為晚清以來的域外遊記、使節和移居者的漢詩、歌謠提供新的理解和詮釋的可能。我們藉此認識到，近現代的中國文化、文學的變革，跟南方生成的華文文學，發生在航路的交錯往返的變動板塊當中，它更是一種相互牽引的「渡越」(crossing)的特質。